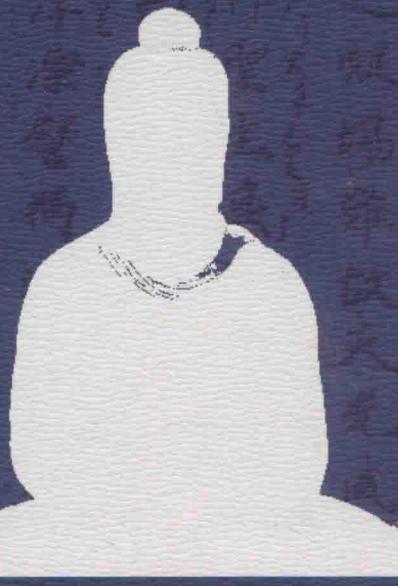


马 骏 黄美华 著



汉文佛经 文体影响下的 日本上古文学

(研究·资料)

(研究卷)

The Ancient Japanese Literature under
the Stylistic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马 骏 黄美华——著

The Ancient Japanese Literature under
the Stylistic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研究·资料)

汉文佛经 文体影响下的 日本上古文学

(研究卷)

本书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人才引进项目资助，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日本上代文学文体与汉文佛经的比较研究”（批准号：12BWW015）的结项成果。

目 录

contents

序编 日本上古文学佛经文体研究方法论

第一章 文体学研究	3
第二章 佛经东传考	9
第三章 独特的方法论	23
第四章 本书宗旨	59

第一编 《古事记》文体与佛经文体

第一章 《古事记》语体判断标准探讨	65
第一节 诸家言说	65
第二节 检证步骤	71
第三节 句式视角	79
第二章 《古事记》佛典双音词考释	89
第一节 佛教词	89
第二节 口语词	94
第三节 新义词	101
第四节 双音词	117

第三章 《古事记》佛典句式探源	149
第一节 词法结构	150
第二节 句子种类	169
第三节 句法连接	184
第四章 变异性表达	211
第一节 词语层面的变化	211
第二节 搭配层面的变化	219
第三节 句式层面的变化	223

第二编 《日本书纪》文体与佛经文体

第一章 成说辩驳	237
第一节 匡谬补正	238
第二节 通说商榷	246
第二章 佛典词语的分布及特征	258
第一节 森博达的书录者三分说	258
第二节 佛典双音词考证	261
第三节 佛典多音词析出	266
第三章 所引文献的佛典文体	305
第一节 文中注释与佛典表达	305
第二节 《伊吉连博德书》的文体	324
第三节 “百济三书”的文体	332
第四章 自创表达研究	343
第一节 意思表达上的创意	344
第二节 语体色彩上的创意	349
第三节 搭配关系上的创意	359

第三编 《万叶集》《怀风藻》《风土记》 文体与佛经文体

第一章 《万叶集》的歌文文体	373
第一节 散文佛源词补遗	374
第二节 歌词佛源词钩沉	381

第二章 《怀风藻》诗文文体	399
第一节 诗人《小传》与佛典表达	399
第二节 僧人诗歌与佛典表达	405
第三节 六朝初唐对句考	410
第三章 《风土记》地志文体	419
第一节 《常陆国风土记》语体句式考辨	419
第二节 其他四部《风土记》多音节词与句式辨析	432

第四编 日本上古文学佛典句式考释（上）

第一章 佛典“随”字句	453
第一节 双音节组词	453
第二节 三音节组词	460
第三节 四音节组词	464
第二章 佛典“相”字句	470
第一节 源自佛典的表达	470
第二节 有别于佛典的表达	479
第三章 佛典“于”字句	482
第一节 内典仅见一种用法	482
第二节 内典可见两种不同用法	493
第三节 内外典可见同一种用法	495
第四节 内外典可见不同用法	501
第五节 内外典皆无的自创用法	502
第四章 佛典比拟句	513
第一节 比较句及其级别	513
第二节 比喻句及其类型	523

第五编 日本上古文学佛典句式考释（下）

第一章 佛典总括句	533
第一节 “如此”式	533
第二节 “如是”式	538
第三节 “种种”式	540

第二章 佛典誓愿句	550
第一节 双音节誓愿词	550
第二节 三字格誓愿词	554
第三节 四字格誓愿词	557
第四节 自创形式的誓愿词	562
第三章 佛典时段句	566
第一节 三音节时段句	568
第二节 四音节时段句	574
第三节 自创时段句表达	592
第四章 佛典口语句	599
第一节 人称代词	599
第二节 疑问句之一——询问句	603
第三节 疑问句之二——反诘句	615
第四节 感叹句	618

终编 日本上古文学佛经文体研究展望

第一章 抠要归纳	629
第二章 共时性研究	
——以《海东高僧传》为例	631
第三章 历时性研究	
——以《法华验记》为例	637

附录

附录一 奈良朝佛经写本题记研究	649
附录二 《杜家立成》的俗字世界及其影响	658
附录三 镇源著《本朝法华验记》中独特的女性形象	
——以表达的出源和构思的日本化为例	668
附录四 宝成本《释氏源流》的语言特质	
——以所引译经为例	677
附录五 《海东高僧传·法空》校注	686
参考文献	707

序 编

日本上古文学佛经文体研究方法论

本书由《汉文佛经文体影响下的日本上古文学》（研究卷）和《汉文佛经文体影响下的日本上古文学》（资料卷）两大部分构成。研究卷有7编19章，约82万字；资料卷是研究卷文献资料的来源和论证材料的依据，采用断代专书词典的形式，网罗本书从日本上古文学作品中析出的佛教词语及出自佛典的词语4960余条，182余万字。资料卷附有日语索引。

序编分作三个部分，从文体学研究、佛经东传考、独自方法论三个方面，阐述了本书研究文体学研究定位、文献学背景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在文体学研究方面，为本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从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背景，汉文佛经的读诵、抄写和研习，举国体制与经典功能四个方面，对佛经东传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察，为本书研究提供深广的文化背景和文献学意义上的确凿材料。序编依据上古文学作品中“言说类”四字语句，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本书对日本上古文学佛经文体研究的独自思考：作为方法论的出源论及其触角，具有两套系统的文献资料及其语言特色，涵括三种类型的文体及其位相表征。所谓具有两套系统的文献资料及其语言特色，具体指传统的中土文献和后起的汉文佛经尽管两者在文体上存在悠久的承继关系，但更多地在语体色彩、词组结构和内容表述上体现出巨大差异。当具有这样一种双重性格特征的中国文献不约而同地传入日本时，势必对尚未有本国文字的奈良时代的言语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上古文学作品中，普遍地存在三种类型的文体及其位相表征，亦即受到中土文献影响的传统表达、源自佛经文体浸染的佛典表达、在传统表达和佛典表达基础上敷衍出的自创表达。自创表达仅属于日本上古文学本身。当我们将其纳入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视阈中去审视时，会发现它彰显的是日本上古文学自身的特质。

本书旨 在全面论述日本上古文学^①与汉文佛经的影响关系，内容由序编、《古事记》文体与佛经文体、《日本书纪》文体与佛经文体、《万叶集》《怀风藻》《风土记》文体与佛经文体、佛典句式考释（上下）、终编7编19章构成，基本涵盖了日本上古散韵两类文体的代表性作品，分别从佛典词语、句式和表达及其变体的角度论证了汉文佛经对日本上古文学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① 按照日本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日本文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和现代。古代文学又分作前后两期：前期指奈良时代（538~809），称作“上代文学”；后期指平安时代（810~1192），称作“平安文学”（中西進、三木紀人、吉田熙生『精選日本文学史』，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83，第12頁）。本书的研究范围锁定在“上代文学”，中文表述为上古文学。

第一章 文体学研究

在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国西方文体学研究、日本上古文体学研究、汉文佛经文体学研究和比较文学文体学研究等相关的研究领域之中，有关文体学的概念及其研究模式和研究范围的见解虽然并非完全一致，但均体现了文体学与相关学科的密切程度。鉴于本书所涉及的对象、范畴及时代因素，我们拟在比较文学文体学研究方法的观照下，特别将日本上古文学文体分类和汉文佛经文体学研究作为梳理的对象，为本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

“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裁样式。“文体学”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格式、体制等形式特征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学”，是现代语言文学研究中相对独立的领域，是最近几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是语言学、文艺学、翻译学、图书分类学、编辑学、比较文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产物。^①

一 中国传统的文体学研究

中国传统的文体学研究可追溯至魏人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②。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确立了早期文体学研究的研究模式，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等大体勾勒出传统文体的研究范围，中国文学独有的语言形式与审美趋向，如体裁或文体类别、体性与体貌、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等是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目前，中国文体学研究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的形成与结构、方法与观念，二是与文体谱系相关的文体价值谱系，三是中国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四是与中国文体对于域外文学的影响。^③ 本书所从事的日本上古文学文体学研究，当与这里说的第四点密切相关。

^① 王向远：《作为比较文学的比较文体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课题与对象》，《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② 刘世生：《文体学的跨学科特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吴承学：《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二 中国的西方文体学研究

西方文体学（stylistics）研究源于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早在公元 100 年就出现了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的《论文体》这样讨论文体的论著。传统的修辞学注重文体的劝说功能，从朗吉努斯（Longinus）才开始注重文体的审美趋向。巴利（C. Bally）是现代文体学的创始人，他在 1909 年所著的《法语文体论》中，为规避传统修辞学的主观直觉式的批评方法，将语言学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运用于文体学研究，奠定了文体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① 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 Spitzer）被公认为文体学之父。在德国厚重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他将文体学看作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的媒介，通过把握文学作品的文体特征，来回溯作者的心路以及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历史。尔后，西方现代文体学经历了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各种文体学流派的兴盛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以话语文体学为代表的兴起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过程。^② 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西方文体学研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有文体及文体学的概念厘清、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体裁范式研究、个人风格探讨、不同研究的有效方法以及文体学发展的未来走向等。^③

比较的角度不同，其结果自然千差万别，如吴承学就曾指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的‘纯文学’体系。”^④ 这种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文学样式及其发展的特色，进而决定了中西方文体学研究范围、研究方式的不同特点。

三 日本上古文体学研究

按照日本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日本文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古代、中世、近世、近现代。古代文学又分作前后两期：前期指奈良时代（538 ~ 809），称作“上代文学”；后期指平安时代（810 ~ 1192），称作“平安文学”。^⑤ 单从文学史的时代划分来看，“上代文学”相当于中国文学史的“上古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在中文行文的背景下，本书所言及的日本“上古文学”即指“上代文学”。德光久也撰写的《上代日本文章史》一文曾对日本近现代的代表性学者有关上古文学文体的分类进行过细致的梳理。^⑥ 兹撮其要义，分作三端，归纳如下。

① 刘世生：《文体学的跨学科特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② 申丹：《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③ 刘世生：《文体学的跨学科特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④ 吴承学：《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学术研究》2010 年第 5 期。

⑤ 中西進、三木紀人、吉田熙生『精選日本文学史』，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83，第 12 頁。

⑥ 德光久也『上代日本文章史』，桜楓社，1964，第 172 ~ 188 頁。

其一，“二分说”。提出这一划分法的学者有佐佐木信纲、吉泽义则和津田左右吉。佐佐木信纲将上古文学作品分作“正格汉文”和“俗文”，前者指符合汉语表达规则的文章体裁（引注：作者没有具体指出哪些作品）。后者指有别于汉语表达习惯的文章体裁，具体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未使用万叶假名的文章（以日语叙述为主的汉文）；二是使用万叶假名或夹杂万叶假名的文章，有的通篇由万叶假名写成，有的仅仅是虚词用假名表示（方法是虚词大写或小写）；一些词语用假名表示（笔者注：如地名、神名等专有名词）。^① 吉泽义则将奈良时期的文学作品按文章体裁分作“汉文”和“国文”^② 两类，再细分作“东镜体”（日记体裁、日汉混合文体）和“宣命体”（日文体裁的诏书、敕令）。属于“东镜体”的作品有《药师佛光背铭》、《上官记》、《法王帝说》、《高桥氏文》、《古事记》、《万叶集》歌题，以及进入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灵异记》、《将门记》、公卿日记、《东镜》等。该文体亦见于朝鲜半岛，最为古老的当属作于天平宝字二年（758）的葛项寺《东塔铭》。“宣命体”同样见于朝鲜半岛。^③ 津田左右吉将上古文学作品分作汉文体裁和“采用汉字书写日文的体裁”两类，后者具体指下面三种形式：舍去汉字的字义，用作标音文字，如“记纪歌谣”（收录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的总称）；借用汉字的字义，用于表示日文，即用作训读文字；上述两种形式混用，即音训兼顾，实用性文体多半采用该形式，《古事记》当中保留下来的“旧辞”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法隆寺《药师佛光背铭》亦可见同一情况。上述三种形式之中，在书写某一词语时，可见三种形式并用的情况，但在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时，多采用第二种或第三种形式。这或许是日文遣词造句的方法与古汉语不同，仅凭第二种形式难以达意的缘故。^④

其二，“三分说”。提出这一划分法的学者有久松潜一、桥本进吉。久松潜一将上古文章分作纯汉文类，如《日本书纪》《常陆国风土记》；日文非纯类，指行文中既有非纯正的汉文，又有不地道的日文，如《古事记》《播磨风土记》；从“祝词”向“宣命”转变的体裁，该类日语表达纯粹，是出于使用汉字表现地道的日文的需要而形成的表现形式，属于处于纯正日文的草创阶段的一种形态，成为后来汉字假名夹杂文体的滥觞。^⑤ 桥本进吉的三分法：一指汉文；二指变体汉文，如正仓院文书中的一些体裁、平安中期以后的男性日记和“东镜”；三指和歌及日文。桥本指出，随着使用汉字的熟练程度的提高，作者开始使用汉字撰写纯粹的日文。在单个的词语表达方面，一是全部使用万叶假名，如“之良受”“美留比”等；二是借鉴汉字汉文的训读法，如“不知其人”；三是混用上述两种情况，如“知受”“见流人”。另一方面，在书写篇章方面，一是通篇采用“万叶假名体”；二是主要按照汉语的语法规则书写，但兼顾训读后

^① 佐佐木信綱編、橋本進吉解説『南京遺文・南京遺芳』（附卷），八木書店，1921。

^② “国文”亦称“和文”，即日文。从文体分类上来看，此类称呼旨在着重强调日语的语言形式和表达风格。

^③ 吉沢義則「語脈より見たる日本文学」，『国語説鈴』，立命館出版部，1931。

^④ 津田左右吉「日本書紀」，岩波講座『日本文学』，1932；「国語学概論」，岩波講座『日本文学』，1932。

^⑤ 久松潜一、倉野憲司「祝詞文の形象と表現意識」，『国語と国文学』，1930年4月。

又能表现日语意思的体裁，如《古事记》；三是按照日语语序，表达各个词语时以混用方式为主，辅以第一、二种方式，如“宣命”等。^①

其三，“四分说”。提出这一划分法的学者是仓野宪司，上古文章的四种文体分别指纯汉文体、准汉文体、“宣命、祝词体”和“万叶假名体”。第一类纯汉文体是当时的文言体，作者多为朝鲜半岛的归化人及司职于文部、史部的归化人的后嗣以及日本知识阶层精英，作品如《日本书纪》、《常陆国风土记》、《古事记》和《怀风藻》的序文、大部分金石文、《万叶集》的歌序和尺牍类、《经国集》中的对策文，等等。第二类准汉文体是当时的口语体，在形式上遵循汉语的句子结构，但主要部分为日语表达，如《古事记》、《播磨风土记》、《法隆寺金堂药师佛光背铭》、正仓院文书中一些文类。第三类“宣命、祝词体”，系日语式表达，鲜见汉语语序倒置的现象，助词和词尾活用细笔小写，但在语法上多遵循古汉语的规则。第四类“万叶假名体”，汉字用作表音文字，《古事记》的作者想做却未能完成的一种体裁，只有“记纪歌谣”和《万叶集》的若干卷采用了这一模式。此外，正仓院文书《续修别集》第48卷中亦见此体写成的文书。以上各种体裁有时单作一体，有时多体并存。^②

通过梳理上述日本学者有关上古文学文体的分类，以下几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是上古文学文体研究始终关心的是文本的体裁样式。因为“在日本文学传统中，通常将文学题材划分为‘诗’（汉诗）、‘歌’（和歌）、‘日记’、‘物语’、‘草子’、‘芝剧’（戏剧）等体裁样式。”即根据文学作品的体裁样式来划分问题类型。^③ 二是诸家都采用比较文体学的方法，严格区分汉文与“和文”或“国文”在语言风格上的异同。其中，确定汉文的标准是所谓纯正与否，即是否合乎古汉语语法规则。因为学者们对古汉语语法规则的把握程度客观上存在差异，所以这里的标准本身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三是在上述多种分类中，几乎都没有涉及汉文佛经文体的问题，这也正是本书的着眼点，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从方法论上来说，要弄清上古文学的佛经文体的特征，需要“注意联系汉籍经史子集等外典文献来考察，有些词汇句式，可能是存在于更早的外典文献中，需要进一步在‘日文典籍—汉译佛经—外典文献’三者之间更用力探查，以免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而失之偏颇”^④。关于外典文献对上古文学“和习”文体的影响，日本学者森博达^⑤和国内的马骏^⑥等都进行过做过详细的考察和论证。

^① 橘本進吉「国語学概論」，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岩波書店，1932。

^② 久松潛一、倉野憲司「祝詞文の形象と表現意識」，『国語と国文学』，1930年4月。

^③ 王向远：《作为比较文学的比较文体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课题与对象》，《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④ 本课题结项时，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特此鸣谢。

^⑤ 森博達『日本書紀の謎を解く—述作者は誰か』，中央公論新社，1999；同『日本書紀 成立の真実—書き換えの主導者は誰か』，中央公論新社，2011。

^⑥ 马骏：《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概要 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四 汉文佛经文体学研究

汉文佛经指汉译佛经、中土僧俗的佛教著述和以宣扬佛教思想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在这三类文献当中，汉译佛经是主体。汉译佛经仅指翻译的佛经，月支僧人支娄迦谶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翻译的《阿閦佛国经》是现存文献中最早有纪年的译经。译经活动大致持续了一千年的时间，直到宋代中期才算基本结束^①。据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统计，流传至今的译经有1482部，总计约5702卷^②。

朱庆之指出，“汉译佛经语言是一种与当时的书面语和口语都有一定距离，并令当时的读者有些陌生和不习惯的语言。”^③ 译经语言具有以下文体特征。其一，散韵并行的体制。译经中习见散文和偈颂交替使用、散文连写而偈颂分句提行，这是对佛经原典的模仿。^④ 其二，数量不菲的双音词。大量的研究表明，较之同期的中土文献，译经词汇的双音化程度更高。究其原因，一是口语的反映^⑤，二是佛经四字格特殊文体的需要^⑥，三是受到原典词汇结构上的影响。其三，强烈的口语化色彩。译经呈现出一种半文半白的体裁特征，即在文言的基础上，夹杂了大量口语或方言的表达成分。^⑦ 由于译者的汉语水平有限，难以区分口语词汇和书面词汇，所以有大量口语词进入了译文。^⑧ 其四，独特的语法句式。一是多用中土文献中未见或罕见的被动句，如不用“为”的“RA所/所见V”等句式；二是特殊的“於/于”^⑨ 和“而”^⑩，比如“尔时世尊，而说偈曰……”（魏译《大无量寿经》下），这里的“而”应作“乃”，但却多用“而”；三是用系动词“是”构成的判断句；四是表示完成态的“已”；五是表示代词复数形式的“等”“曹”等；^⑪ 六是表示否定的副词“非”的句中位置^⑫，如“二乘非所测”（魏译《大无量寿经》下）的正规说法应是“非二乘所测”。其五，非汉语感觉的句式。由于大多数句子多半按照原典逐字逐句翻译，不少句子的结构仍保留着原典的痕迹，如讲经说法的头一句“如是我闻”^⑬、常见的开场白“一时……与……俱”^⑭等。

^① 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第7页。

^② 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

^③ 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第8页。

^④ 朱庆之：《敦煌变文诗体“换言”现象及其来源》，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⑤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与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84，第5~9页。

^⑥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

^⑦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与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84，第45~46页。

^⑧ 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第15页。

^⑨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

^⑩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与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84，第6页。

^⑪ 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第16页。

^⑫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与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84，第6页。

^⑬ 辛岛静志：《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俗语言研究》1997年第4期。

^⑭ 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第16页。

五 比较文学文体学研究

王向远在《作为比较文学的比较文体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课题与对象》一文中指出：“比较文体学”就是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进行的文体学研究，是从横向和纵向对世界各民族文学不同文体的产生、演变和消亡及其内在关联进行的研究，并对世界文学史上各种文体的特征、功能及其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审美心理等各方面的成因进行对比分析。比较文体学的研究课题包括三个方面：各民族文学中的文体划分及其依据与标准的比较研究，文体的国际移植与传播的研究，当代文体的世界性与国际化的研究。^①这里所论及的文体的国际移植与转播的研究，对本书的研究颇有启示意义。所谓国际间的文体移植，“是指一个民族的文本体裁，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方式，传播到了民族文学之外，被其他民族的文学所接受、消化乃至改造，并成为该民族文学的一种新的文体类型”^②。例如，早期的汉文佛经的体裁，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上古时代，再通过奈良朝文人的借鉴、吸收和自创，最终形成日本上古文学的特殊文体，即先进的中国传统文体、实用的汉文佛经文体和本土化的自创表达相互夹杂的一种混合文体。

本书运用中日传统的文体学研究、汉文佛经文体学研究和比较文体学研究的方法，着重对上古文学中的佛经文体进行调查、分析和归纳。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上古文学文体与汉文佛经文体之间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处于草创期的日本上古文学，源自汉文佛经的母题、题材及素材等影响要素较为有限，且多为显性的，所以大多已经被日本学者指出。而受到汉文佛经文体影响的语言形式和表达风格尽管为数不菲，但多为隐性的，故而在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并未见到系统性的研究。加之日本学者多半习惯于通过训读文来研究上古文学作品，因此遮蔽了上古文学作品中的佛经文体。而直面原文、回归文本，恰恰可以体现中国学者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学养意识。

① 王向远：《作为比较文学的比较文体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课题与对象》，《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② 王向远：《作为比较文学的比较文体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课题与对象》，《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第二章 佛经东传考

中日早期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表明，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进行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概莫能外。中国佛教首先传至朝鲜，再经由半岛传入日本。当时的朝鲜半岛三国鼎立，北部有高句丽，东南部是新罗，西南部是百济。^① 因此，在讨论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问题之前，十分有必要对作为传播途径的朝鲜半岛的佛教生态进行考察。按照学术界通行的说法，佛教在四世纪后半叶传入高句丽和百济，五世纪前半叶传入新罗。尽管中国佛教在三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三国朝廷先后对佛教的教化作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最终积极弘扬佛教，大规模修建佛寺，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僧。

一 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

首先，高句丽国的佛教传入。《三国史记》卷 18 《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二年（372）六月条：“秦王苻（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又：“四年，僧阿道来。五年春二月，始创肖（省）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② 前秦王苻坚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向高句丽国派遣使者，僧人顺道同行，并赠送佛像和经卷，由此拉开佛教在高句丽传播的序幕。小兽林王四年（374），僧人阿道前往布道。翌年，修建省门寺和伊弗兰寺，分别用作顺道、阿道弘法的道场。其实，在佛教公传之前，民间人士已经更早地接触到了佛教。梁慧皎撰《高僧传》卷 4 《义解》：“支遁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棲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刘公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东晋支遁（314 ~ 366）在写给高丽道人的书信中充满对大德竺潜（286 ~

①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 20 页。

② 金富蘇著，金思燁訳『三国史記』，六興出版，1978，第 371 頁。该书作者是高句丽的金富轼，生于 1075 年，卒于 1151 年。历任户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等职。1147 年受封为乐浪郡开国侯。《三国史记》较为详尽地叙述了新罗 992 年（前 57 ~ 935）、高句丽 705 年（前 37 ~ 668）、百济 678 年（前 18 ~ 660）三国争雄朝鲜半岛的历史。

374) 的赞美之辞。从支遁与高丽道人的交往来看，高丽道人当是一个留学江南的僧人。该例足以说明在佛教公传之前，高句丽民间已经有人接触到佛教，并与中土高僧有过密切的交往。

高句丽国佛教的特点有三：一是历代国王对佛教的大力扶持；二是以混杂的形式同时接受了前燕（337~370）、前秦（350~394）的华北佛教与东晋江南的贵族佛教；三是涌现出多位佛学造诣精湛的学僧，如江南三论学派的鼻祖僧朗、日本三论宗的始祖慧灌^①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8《法度传》：“度有弟子僧朗，继踵先师复纲山寺。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僧朗曾师事法度，学习经论，尤其精于华严、三论之学。历住摄山栖霞寺、钟山草堂寺讲经说法。梁天监十一年（512），武帝仰慕僧朗的德望，敕令僧诠、僧怀等10名硕学在僧朗门下薰习三论。僧诠继承师学，与法朗、吉藏师资相承，集三论学派之大成，最终成为江南三论学派二祖。

其次，百济国的佛教传入。《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枕流王元年（384）九月条：“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②由此可知，东晋胡僧摩罗难陀于枕流王元年到来，是在百济国佛教公传的元年。在三国之中，法华信仰是百济佛教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发正、玄光和慧显三位高僧的事迹足以证明这一点。唐僧详撰《法华经传》卷6《讽诵胜利》曰：“百济沙门释发正，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义趣，亦修精进，在梁三十多年。归本土发正道闻他说，越州界山有道场，称曰观音，有观音堵室故往视之。”发正于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来到中国求法，滞留三十多年。发正回国之际，在越州山里的交界处，耳闻目睹了受持《法华经》以及信奉观音菩萨的种种功德。

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23：“大建中南岳思禅师，为海东玄光法师说《法华经安乐行义》。归国演教，为高丽东国传教之始。”玄光于南岳衡山跟随晚年的慧思（515~577）学习《法华经安乐行义》，印证法华三昧。在慧思的弟子当中，获得授记的只有何玄和智顗。受慧思嘱托，玄光于威德王年间（554~598）回国，在百济教化民众，在熊津翁创建寺院，聚众说法，成为百济传播佛教的第一人。玄光手下有火光三昧和水光三昧两名弟子，名字取自《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言其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者

^① 《日本书纪》卷22《推古纪》三十三年正月条：“三十三年春正月壬申朔戊寅，高丽王贡僧惠灌，仍任僧正。”（小島憲之、直木孝次郎、西宮一民、藏中進、毛利正守『日本書紀二』，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館，1996，第588頁。）“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以下省称“新編全集本”。以下日语原文引用中繁体字统一为简体字。断句和标点符号依据汉语表达习惯。汉文佛经文献同此，但对四字格语句会尽量加以体现。从当时东亚中日韩三国的关系来看，“新編全集本”栏上的注释指出，即使此时隋王朝灭亡了，但高句丽仍然难以心安，所以作为寻求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的一环，为了满足日本迫切希望振兴佛教的愿望，而派遣了僧侣。

^② 金富蘇著，金思燁訳『三国史記』，六興出版，1978，第474頁。